



◎ 亲历者的记忆

红军长征重大 决策见证录

杨胜群 陈晋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亲历者的记忆

红军长征重大 决策见证录

杨胜群 陈 晋 主编
孙东升 副主编
王香平 高长武 编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 / 杨胜群, 陈晋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0
(亲历者的记忆丛书)
ISBN 7-108-02555-8

I. 红... II. ①杨...②陈...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1936) - 回忆录 IV.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528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5
字 数	300 千字 图片 52 幅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一、准备长征——长征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1. 中央红军为什么决定长征 3
2. 中央红军长征做了哪些战略准备 10
3. 红二、六军团为什么要进行长征 31

〔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

——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1934 年 10 月 8 日) 35

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

(1934 年 10 月 9 日) 41

二、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决策——中央红军究竟向哪里转移

1. 通道转兵和通道会议的一些情况 49
2. 为什么要召开黎平会议 55
3. 黎平会议做出了什么决策 66
4. 黎平会议精神的传达及其意义 71
5. 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方针 76

[附]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

（1934 年 12 月 18 日） ----- 77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

（1935 年 1 月 1 日） ----- 79

三、遵义会议的决策——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历史大转折

1. 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准备 ----- 85

2. 遵义会议做出了哪些决策 ----- 93

3.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与贯彻 ----- 111

4.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 127

[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1935 年 2 月或 3 月） ----- 133

四、扎西会议的决策——红军向川黔边发展

1. 军委为什么要进行扎西整编 ----- 143

2. 扎西会议决定缩编部队 ----- 144

3. 红军各军团缩编的情况 ----- 155

[附] 中革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

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1935 年 2 月 7 日） ----- 157

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1935 年 2 月 10 日） ----- 159

五、会理会议的决策——统一红军作战指导思想

1. 为什么要召开会理会议 ----- 163

2. 会理会议决定立即北进 ----- 167

3.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 176

[附] 朱德关于我军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进行休整的

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 年 5 月 12 日） ----- 178

朱德关于十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

(1935 年 5 月 12 日) -----180

六、两河口会议的决策——长征北上方针的初步确立

1.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进行战略转移 -----183

2. 红四方面军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 -----189

3.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4

4. 两河口会议及其决策 -----207

5. 会师后的不和谐声音 -----214

〔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两河口会议）

(1935 年 6 月 28 日) -----219

两河口会议的基本情况和战略方针 -----221

七、芦花会议的决策——总结经验，共同对敌

1. 大敌当前，情势艰险 -----231

2. 芦花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234

〔附〕中革军委关于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

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

(1935 年 7 月 18 日) -----236

八、沙窝会议的决策——反对动摇，重申北进

1. 松潘战役计划的破产和夏洮战役计划的制订 -----239

2. 沙窝会议重申北进方针 -----241

3. 沙窝会议决策的贯彻执行 -----249

〔附〕夏洮战役计划（1935 年 8 月 3 日） -----251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

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

(1935 年 8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255

九、毛儿盖会议的决策——讨论北上战略方针

1. 毛儿盖会议讨论北上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行动计划 267

2. 毛儿盖会议后的行动 270

〔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 274

总政治部关于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

（1935年8月20日） 277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给左路军的通报

（1935年8月24日） 281

十、俄界会议的决策——中央红军成功实现北上战略目标

1. 俄界会议的重要决策 285

2. 对张国焘分裂路线的批判和斗争 291

〔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1935年9月10日） 295

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 297

十一、榜罗镇会议的决策——确定长征落脚点

1. 哈达铺整编与长征落脚点的初步确定 303

2. 榜罗镇会议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 311

3. 进驻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316

〔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给红二十五、

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1935年10月） 333

十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1.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337

2.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348

3. 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	365
4. 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	383
[附]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庆祝二、四方面军胜利 会师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936 年 7 月 1 日)	385
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 (1936 年 6 月 28 日)	388
中央为热烈欢迎二、四方面军北上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936 年 8 月 3 日)	390
后记	391



准备长征——

长征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长征虽然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但大多数红军将领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踏上漫漫征途的。

1. 中央红军为什么决定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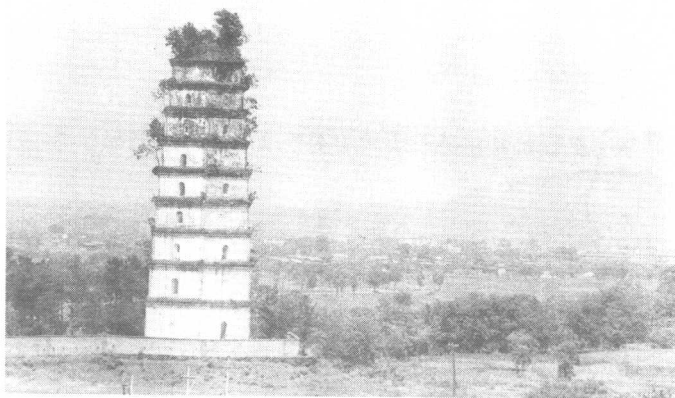
毛泽东（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

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

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1945年5月~1964年3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江西瑞金——中央红军 1934 年 10 月 10 日从这里开始长征

周恩来（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1933 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 1933 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共产国

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邓小平 (长征前任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 ——

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和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云 (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

我们党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巩固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需的,没有这样的根据地会给今后的国内战争带来很大的困难。还在1930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已经指出:建立根据地是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共产党过去执行这一任务,在今天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目的,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王稼祥 (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

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前,王明从苏联派来了李德,要中央完全听信这个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德国人,委任为军事顾问,使我党的军权掌握在这个人手中,得以将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完整地贯

彻到军事工作中。记得有一次在李德那里开军委会，我负重伤，带病参加，讨论如何对付敌人出动一百万兵力的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这是毛泽东同志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提出的唯一能粉碎敌人“围剿”的英明决策。可是，却遭到李德等人的反对，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与敌人拼消耗”等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英勇作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丧失了主动权，党和红军都惨遭极大损失，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退离中央苏区……

1934年，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了高峰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方法上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完全相对抗，它以极“左”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形势，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等。这条“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运动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红军被迫长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减到三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79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刘伯承（长征时曾任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

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回顾长征》，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聂荣臻（长征前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到了10月，中央苏区日益缩小，红军日益陷于被动，“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单纯防御的方针遭到彻底破产。他们总不愿意让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实行机动作战，而提出“以碉堡对碉堡”，死守苏区每块“国土”，“寸土必争”，“拒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被迫不能不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叶剑英（长征前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前三次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赢了。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以后，开始研究我们的作战方法。从第三次“围剿”开始，每一次都采用了与前次不同的方式。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法，层层筑堡垒，节节推进，步步为营。

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最后决定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是没有办法了，才采取的行动。[《长征的艰险历程》，《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伍修权（长征前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

红军之所以被迫放弃已经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艰难困苦的长征，正是由于当时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领导，将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不了解中国国情和军情的李德，从而丢掉了正确的游击战争原则，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只得实行战略转移。我当时奉命担任李德的翻译，在他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上，听他开场就说什么：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进行正规战的时候了。他实际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只凭他以前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不顾当时当地实情，照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而当他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战斗失利时，就动不动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李德都是按照他那一套“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军事主张指挥的。当时，彭德怀同志指挥三军团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高虎脑，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个胜仗，但已无法扭转整个广昌战斗的失利。彭德怀对李德的瞎指挥很不满意，在前线当面说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说李德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彭德怀气愤地对李德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痛切之余，彭德怀怒斥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这句话，我这个武汉人没听懂，杨尚昆同志给解释了一下，才弄明白这句湖南俗语的意思。彭德怀是用来批评李德给红军和革命造成这样大的损失，却没有痛惜之心。我把这句话如实翻译给李德听，他大为恼火，说彭德怀是封建脑筋。但是，他知道彭老总不是好惹的，只得硬把心头的怒火压着。由此可见，李德那种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可一世、专横粗暴的瞎指挥，很不得人心。[《伍修权谈长征》，《长征大事典》下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朱瑞（长征前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由于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严重的单纯防御的错误，所以1934年10月间江西基本苏区在敌人紧缩政策的堡垒主义封锁下，已陷入法西斯

带血腥恐怖的烽火中。这不但限制了苏区与主力红军的发展，而且最后限制了在江西苏区范围内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光荣神圣事业。为着开展革命战争到全中国去，为着保卫江西的基本苏区，1934年10月16日下午中央红军野战军在党和中央政府新的战略方针下趁着初冬天气的斜阳，踏着一片落叶与微风，开始离开江西苏区，向着艰苦与伟大的任务——向着新的苏维埃中国的胜利道上迈进着。[《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7期]